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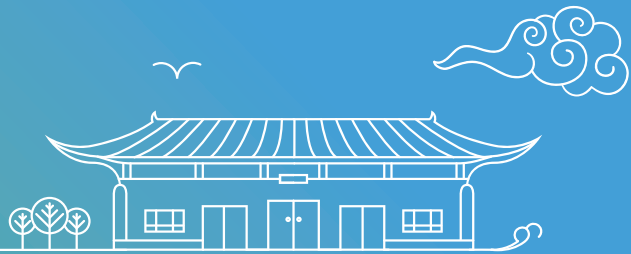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5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长补短，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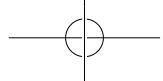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研究院简介

“博雅工作坊”第四工作间 欧洲的挑战与选择 2018年4月12日

博雅工作坊第四工作间以“欧洲的挑战与选择”为主题，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主持并作主旨发言。此外，董强、钱乘旦、沈坚、孔田平和连玉如教授也分别做了重要发言。

董强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试论当今欧洲的文化选择”。他首先阐述了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专家的两种类别，一种是外语专家，主要在外语系从事外语专业，属于语言或文学两个学科；另一种是社会学、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学等领域学者。这两类学者及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他希望语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打破界限，互相取长补短，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是实现这种期待的一个平台。

接下来董教授介绍了他所在的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名称来源。他指出，这个科学院应该是法兰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但为什么叫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呢？因为它成立于18世纪末，当时并没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称呼。但是由于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使得法国人意识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已经是原先的学科所无法面对和解释的。它既非自然科学，也非艺术，也非文学。维系人类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伦理、道德和风俗，在法语中，“风俗”跟“道德”有共同的词源。维系社会运行的是政治，所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就应运而生。在这个机构里有欧洲最重要的人物，与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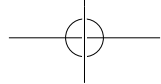
随后，董强教授讲述了两位政治家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其中一位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另一位是阿兰·佩尔菲特。2005年，希拉克总统在一个告别演说中曾说，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甚至最重要的国家，任何世界上的问题都需要把中国放置进去一起思考。当时中国尚未举办奥运会，持这样一种政治话语，而且希拉克的任期已到，无需讨好任何人。另一位阿兰·佩尔菲特，时任美国某部部长，是当时唯一到中国见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家。他曾根据他文革期间在中国旅行的经历写作了一本名为《当中国有一天醒来》的书。该书在80年代成为法国畅销书，使世界为之震动，如今看来对中国有一种极强的敏感和预见性。董教授据此分析，这两位政治家之所以比许多汉学家和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的预见性更强，是因为他们不仅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而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上。希拉克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十分向往，对青铜器、中国哲学、中国古代诗歌、中国书法等等非常着迷；阿兰·佩尔菲特曾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也就是说，不是他们有多么了不起的政治智慧让他们预见中国的今天；他们有政治智慧，但并不在此，而是在于对中国的直觉、热爱。除此之外，前总统拉法兰也有一个类似的判断，即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既然历史上能够产生那么伟大的思想方式、文明和文化，那么在当今世界，这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它应有的话语权和地位。

基于以上观察，董教授表明了两个态度。第一，希望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能够立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研究，尤其要专注于做一些真正的学问，而不是研究一些过于实用的智库性题目。事实证明，做谁能够上台、谁能够当总统等等预测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首先这种预测不一定被决策层认可，即便被认可也不一定就能够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因为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而总是在双方的交往和博弈中产生新的关系和新的问题。比如当

今的中美问题、中朝问题都是最好的例子。有些相对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比说在日本，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菊花与军刀》这样的书，总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民族。

第二，关于欧洲的文化选择。这一问题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欧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广博的文化概念。我们处在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开放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尤其对欧洲而言是根本性的状态。这种开放曾以最残酷的方式出现，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发现新大陆还是殖民，欧洲一直在推行一种类似强制的全球化的政策。尤其是19世纪末，法国的美好时代是建立在殖民地上的繁荣，来自殖民地的新原材料和劳动力都为法国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为法国、德国、英国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发展，也升级了德法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欧盟最初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讲是欧洲意识到法德冲突的危害性的结果。各国领导人对消弭法德潜在矛盾，共同推进欧洲阵营的形成，做出了全面的努力。1985年，流亡到法国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耶路撒冷领取文学奖时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他提到，以色列是欧洲的心脏，是一颗在母体之外的心脏。因为犹太人的经历代表了欧洲的国际精神，换句话说，很少有欧洲国家完全将自己视为自足的国家、封闭的国家，他们都认识到走出自己的国土与邻国随时交往的必要性，“唇亡齿寒”这个出自《左传》的成语尤其适合于欧洲国家。

在法国，马克龙总统上台后的一些作为，显著体现了欧洲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依赖性，以及重新找回某种可为欧洲带来新的凝聚力的努力是非常明显的。2018年4月9号，马克龙在主教大会上冒时代之大不韪提出，有必要修复教会与国家政府之间被损害的关系，明显是出于对欧洲共同文化的寻求，尤其是在伊斯兰势力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在索邦大学的演讲还是法兰克福的书展上的



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形成一种类似于十八、十九世纪时期欧洲梦想的文化正在这位年轻的总统思维中形成。欧洲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开放性的文化。欧洲问题不能停留在它的自身去研究，更多的是要研究它的延伸，即研究它的影响范围或势力范围，至少是一种心理上的、由于近现代传统而形成的范围。著名的有法语文化圈、西班牙语文化圈等。反观中国，汉语文化圈固然非常重要，但由于中国本土在比例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文化圈的政治、经济内容并不凸显，但是对于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而言，由此延伸出来的文化圈的意义可以超出它的本土。

基于以上分析，董教授提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欧洲的国际性使得它不会进入一种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完全占上风的状态。固然，由于恐怖主义、难民等问题，每个国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自我保护，但是很难想象欧洲会回到一个封闭自己或者以邻为壑的状态。在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前提下，欧洲只有一种选择，即通过在自身内部的开放求得一种可以与中、美抗衡的体量和资格，同时借助自己强大的国际文化以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和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来吸引全世界人的到来，并以此为依托，继续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的欧洲的世界梦。

冯仲平教授作了题为“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的精彩发言。他指出，当前存在多个研究欧洲的视角，如地理的视角、宗教的视角、国际关系的视角、地区联合的视角等等。他主要从欧洲战后一体化的视角来分析欧洲当前面临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首先，冯教授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 1945 年二战结束。二战的结束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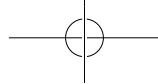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欧洲带来了世界中心地位和世界领先地位的丧失，很多人预测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下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事实却是，在痛定思痛之后，欧洲探索出一条或者说被迫走上一条国家联合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创了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的新局面，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冷战结束。冷战结束给欧洲带来东、西欧分裂的结束，欧盟成为欧洲的代名词，欧洲进入一体化的黄金时代，欧盟和北约同时向东扩大。一方面，欧盟成员国数量逐渐递增。欧洲一体化伊始只有 6 个成员国，柏林墙垮台前增加到 12 个，冷战结束后至今达到了 28 个。另一方面，欧洲统一了货币。这么多国家共同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说是全球国际关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冯教授总结说，自 1945 年至今，经过六、七十年年的发展，欧洲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欧洲面貌的是一体化，它扭转了欧洲战后的颓势，把欧盟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经济体和最有软实力的国际行为体。

接下来，冯教授分析了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欧洲一体化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推进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把欧盟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三个。

第一，疑欧、反欧势力高涨。在二十年前，除英国和丹麦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在拥抱欧洲一体化。如今已斗转星移，疑欧和反欧的势力受到三种力量的驱使。一是 2007 年欧盟宪法的公投失败，表明对欧洲一体化怀疑、反对的力量在上升。二是此后十年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加上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欧洲的不满情绪很高涨。三是这种情绪被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组织和政党所利用，他们提出通过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欧洲一体化这“三反”来解决欧洲的问题。这种力量有极左和极右两种面孔，力量强大。英国人和欧洲人从来不是一条心，但能通过 2016



年公投脱欧，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民粹主义的力量。在法国大选和德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也令人担忧。也就是说，疑欧和反欧已经不是个别欧洲国家的个别现象，过去民粹主义的边缘性政党如今登堂入室，进入议会和政府，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挑战。

第二，欧洲内部的矛盾增大了。内部矛盾南北东西都有，其中“东西”主要指老欧洲和新欧洲，即西欧和中东欧。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中东欧国家拒绝接收，主要是西欧国家在承担成本。“南北”指的是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欧债危机中，希腊等国希望北欧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但过去十年矛盾增大，让欧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下降了。

第三，欧洲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变化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二战结束后搞一体化的初心是消灭战争、建设和平，推进成员国尤其是法、德两国之间的和解。时至今日，欧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不可想象，因此一体化的动力事实上减弱了。欧洲一体化的和平初衷的另一层含义是要联合对付苏联。然而冷战结束后，尽管与俄罗斯毗邻的欧洲国家，如波罗地海等国仍对俄罗斯有很大的疑虑，但今天俄罗斯的威胁与冷战时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三个变化是美国战前一以贯之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美国总统乐见英国脱欧和欧盟解体，对欧洲的打击是很大的。

随后，冯教授分析了欧盟未来的发展方向。他首先提出一个总的判断，即尽管欧洲的发展前景有不确定性，但欧盟不会像苏联一样突然解体和瓦解。他指出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欧洲未来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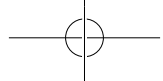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第一，民粹主义的力量，即反欧盟一体化、反建制的力量会在欧洲长期发挥作用，但不会成为主导欧洲的政治力量。

第二，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非常关键地扭转了民粹主义对欧洲的威胁，但他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措施和方案不容乐观。一方面，从目前法国频频罢工的事态来看，很难说马克龙的改革在法国能走多远；另一方面，尽管目前联合政府中社会党是亲欧洲的，但德国议会力量格局已发生变化，德国能在未来与法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合作中发挥多大作用也难以预测。

最后，冯教授就“欧洲一体化未来怎么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一体化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同步前进的、同速的，这是导致目前问题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可以选择一个新的模式，即双速欧洲，甚至多速欧洲。这意味着允许在欧盟目前的27个国家中存在几个车道，允许快车道和慢车道同时存在。马克龙能推动的可能是快车道，其他国家未必跟得上，这在防务一体化上已经有所体现。这个推动一体化的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钱乘旦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加泰罗尼亚公投说明什么”。钱教授分析了加泰罗尼亚2017年独立公投及其结果的意涵。他指出，通过人民公投来决定加泰罗尼亚的前途是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授权。既然公投结果显示，大部分选民支持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离出来独立建国，但为何无法实现呢？因为欧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均公开表示不承认和不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支持人民授权的民族自决，几乎成为政治正确。那为何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呢？其理由是维护西班牙的领土完整与主权。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联合国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维护各个国家的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然而，三十年前苏联解体时，西方社会一片欢呼。苏联的解体有制度性、建构性的原因，即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构成的，这15个加盟共和国是以民族居住区、聚居区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基本标准。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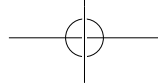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解体时，这些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理由就是民族自决。在俄联邦出现之后，其最初的政治建构仍然是以民族居住区作为基本框架，所以一旦以民族自决为旗帜，俄联邦的解体是有可能的。但是俄联邦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尤其是普京上台以后，把民族居住区为单位的区划变成了以单纯的地理界线为区划，打破了民族界限。这样推动俄联邦的解体就不大可能了。第二件事，科索沃事件。当时南斯拉夫解体，科索沃要退出塞尔维亚，要求独立。于是塞尔维亚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发生了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科索沃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如果要打仗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能够把所谓的独立镇压下去，非常容易。可是，由于西方的帮助，塞尔维亚投降并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科索沃独立了。西方国家支持科索沃的独立，并希望看到俄联邦的解体，理由就是民族自决，再加上人权至上，就构成了政治正确。

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上，加泰罗尼亚公投似乎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是民族自决，也是人权至上，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正确。西方大国却公然出面反对，实际是怕加泰罗尼亚独立会引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加泰罗尼亚是中世纪的一块领地，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现代形态的国家，而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地。如果拥有这样历史基础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了，那西班牙不仅有加泰罗尼亚，是否像巴斯克、阿拉贡、卡斯蒂尔、格林纳达这些地方也可以独立？这样西班牙就可能被分割成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以此类推，比利时可以变成三个国家，荷兰可以变成七个国家，瑞士可以变成三个国家，法国可以变成几十个国家。中世纪的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具有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居民和特殊的认同感，可以说成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这对欧洲来说就是灾难，就是回到中世纪。如果德国也被分割，那么西欧、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就将不复存在，这是西方国家所无法接受的。因此，无论政治正确还是不正确，不能让加泰罗尼亚独立。

第二，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也勾起了欧盟是什么的问题。西班牙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按照欧盟自己的说法，欧洲一体化就是欧盟，欧洲一体化超越了民族国家。但是，如果欧盟真的超越了民族国家，就应该让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只是离开了西班牙，而没有离开欧洲和欧盟。但是所有的欧盟的主要官员全部表态称，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理由是维护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个理由意味着，欧盟承认作为成员国的西班牙是民族国家。如果说欧盟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已经公开承认西班牙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那么欧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钱教授提出，他认为欧盟没有超越民族国家。其理由是，在2008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中，欧盟各国都是以邻为壑的，即可以同甘、不能共苦。在难民潮中各国表现同样如此。对于欧盟是什么的问题，钱教授提出，到现在为止它只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他们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单位组建形成的，但是他们会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样的共同行动的行为主体仍然是国家，但是欧盟是有一套共同行动的规章制度，却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他进一步指出，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超越民族国家。

接下来，钱教授追溯了欧洲一体化出现的历史，并分析其原因。他指出，出于和平原因主要是指缓解德法两国之间的矛盾，不至于涉及到整个西欧，更不至于把东欧都包括进去。所以，除了化解德法矛盾之外，欧洲一体化有更加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一方面是苏联的存在，冯仲平教授已对此作了详细解读；另一方面是二战改变了几百年以来欧洲主宰世界的格局，在欧洲东面出现一个新的霸权苏联，在欧洲西面出现一个新的霸权美国，欧洲国家夹在这两个霸权之间，它只有抱团才能够取暖。比如欧洲一体化的创始人之一舒曼曾说，欧洲如果想不受美国的控制，就必须联合。



最后，钱教授总结道，欧洲的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不像西方的理论家，尤其是欧洲的理论家说得那样美好和动听。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话说得越美好，现实越不美好，欧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最后强调，欧盟实质上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

三位发言人演讲结束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和彭小瑜教授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集体参与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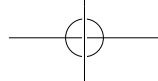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其中彭小瑜教授指出，当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比较缺乏社会经济分析。他提到，不只是欧洲的问题，包括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否需要像中、印、非洲的问题一样有经济分析的角度。他认为，现在这个世界需要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形式很多种，但是失去以后，对很多问题的观察、评价和应付、应对会缺少一个比较重要的角度。此外，他引用桑德斯批判希拉里说拉美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掩盖的恰恰是美国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的说法，提出我们现在也是用同样的思维掩盖社会经济问题的最根本的公平的问题。此外，彭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即现在欧洲问题、世界问题中的主义问题有多大。

接下来，王希教授也做了评论。他指出，欧洲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建构。欧盟能够维持，政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员国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同性、相近性也非常强。但是在苏联解体、东西欧合并后，出现了欧盟内部的发展，即两个欧洲甚至多个欧洲不同步的发展，会成为欧洲一体化巨大的风险。我们在界定区域的时候要看区域的历史建构是怎么回事，维持它的关键在哪里。第二，文化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界定一个区域？英语和法语可能是一种英国人和法国人用的语言，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很多国家都用英语和法语。我们该思考的是，区域研究跟文化

圈的关系在哪里？是不是所有区域研究都是单纯的？它的核心动力在哪儿？核心建制在哪儿？这种泛文化的地方，所有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用语都是西方的，如果我们做这个区域如何创造新的方法？王教授还指出，欧盟之所以可以建成，是因为战后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上，中国要作为一个新的大国崛起的话，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哪些是能够像当年的英国、法国，到后来的美国能够传播到全世界，为他征服的人所接受，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王教授最后就民族自决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说，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是在1918年，现在看起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世界上的有三个大的区域，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欧洲为什么不能成为美国，欧洲为什么成为不了中国？这是一个问题。

李强教授就王希教授提出的民族自决问题作出回应。他说，威尔逊倡导民族自决，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们如山倒般坚决反对。坚持民族自决，苏联建立起加盟共和国都是解决方案，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时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不大可能，首先想到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了苏联的一国建立。在建立起来以后，孤立无援，国际共产主义看起来遥遥无期，马上把眼光投向亚洲。民族自决也是列宁主义核心的一部分。列宁和威尔逊是同时期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创造了非常伟大的制度，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贡献。

连玉如教授回应了钱乘旦教授对欧盟是什么问题的看法。在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和欧盟的性质问题上，欧洲不论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很忌讳或避免谈论，有来讲课的欧洲教授说欧洲一体化只有进程、没有目标。关于欧盟的性质，从一开始共同体的高级机构欧盟委员会开始成立就具有超国家性，所有成员国都平等的置于高级机构的管辖之下。当今世界上有很多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或联合体，跟欧盟相比，欧盟的独一无二性就体现在它的超国家性，其他组



织都没有转让国家主权。连教授给欧盟下了一个定义，即欧洲联盟是一个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辅助性原则是一个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原则，后来欧盟 1993 年签订马约的时候把这个原则纳入欧洲联盟条约，意思是成员国能做好的事欧盟不要干涉，只有成员国做不好而欧盟介入才能做好的时候再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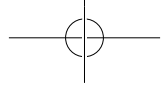
冯仲平教授就欧盟是什么和欧盟的性质提出自己的简介。他说，欧盟一体化每一次进展都要签订条约，这本身就说明欧盟的成员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签订条约的时候要讨论一体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每个国家都有发言权，法国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欧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德国说可以，英国则不同意，最后达成的妥协是“日益紧密的国家联盟”。欧盟的目标就是这样的模糊状态，目前欧洲人对一体化向何处走的确说得不那么清楚。对于欧洲联盟的性质问题，冯教授指出要看一体化主权上交的过程。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主权独立的成员国和平地、自愿地、部分地转让主权。但是这个转让主权的进程可以说刚刚开始，货币主权已经转让但也不是全部；边境仍然存在，只是取消了边境警察。目前的欧盟是这么个情况。

钱乘旦教授指出，我们所讨论的欧盟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本质上涉及到国家形态的问题。国家形态不是永远不变的，以前不是，以后肯定也会变，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定会变。此外，钱教授指出，欧盟即使最后真的完成了康德主义的或歌德主义的或理想主义的一体化，它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苏联是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世界其它任何部分它都是民族国家，它逃不掉这个归宿，除非整个世界最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四工作间下半场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冯仲平研究员主持。

李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与思想基础”。李强教授指出，欧洲近几年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方兴未艾、愈演愈烈，从最早的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扩展到欧洲许多国家。这促使人们思考，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暂时的现象还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便有必要研究它的社会和思想原因。李强教授将这一问题分解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当代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向认同政治的转变，右翼民粹主义与认同政治的关系，欧洲当前的困难处境。

纵观国际形势，传统的利益政治正在向认同政治转变，这是近代以来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上发生的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近代以来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利益政治，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利益成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阶层或者阶级利益；继而形成代表不同阶层或阶级利益的政党和意识形态，例如代表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政党政治长期以来构成西方政治的主轴，虽然自 19 世纪以来经过不少变化，但从长波段的角度来看，利益政治一直构成政治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从近些年的全球社会思潮来看，这一主旋律发生了变调；而 2015 年，或许可以看作变调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变调的实质是认同政治逐渐取代利益政治成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和国家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认同政治，也即 identity politics，关乎个人及群体的身份认同，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文化等方面。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首先，在发达国家，随着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产业工人阶级萎缩，传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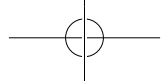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大规模的劳资对立不再是常态。其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全球劳动力、资本、商品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经济尽管在整体上有受益，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第三，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相关的恐怖主义给西方国家带来极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基于民族、族群、宗教认同的政治主张，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话语重新成为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

认同政治的出现，超越了利益政治对国内政治和全球秩序的定义方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构成性原则，形成崭新的政治理念。认同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形式的右翼主义思潮和右翼政治势力的兴起。在西方国家，这一转变正在改造左右翼的政治格局。传统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在日益衰落，因为其原先具有号召力的东西不在了；传统自由主义政党因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而日益受到质疑。各种右翼势力和意识形态正成为西方政治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以认同政治为号召的右翼势力，有较大的号召力。若将政治格局简单化，可以概言为，左派已经衰落，自由主义正在衰落的过程中，右翼势力崛起。在右翼势力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右翼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势不可挡。中下层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强烈被剥夺感以非常急剧的方式呈现，传统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被民众视为追求全球化目标，背叛国家利益的群体而遭受抨击。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写过一本书《我们是谁》，他认为美国的出路有三个方案：一是“世界的美国”，回归威尔逊主义，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并提供公共产品；二是“美国的世界”，美国至高无上，坚持用美国的价值观、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甚至不惜实现政体更换，这就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第三，也是亨廷顿坚持的，要做“美国的美国”，即回到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追求美国自身的利益。可以说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便采纳了第三个方案。

较之美国，欧洲的处境更为困难，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长期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乏力；但在目前大的政治格局框架下，欧洲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第二，穆斯林移民、难民以及欧洲一体化后东欧劳工的涌入，对新兴国家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挑战下，原本经由启蒙运动已经彻底世俗化的欧洲，已经缺乏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保卫自身的制度和文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右翼思潮日益成为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挑战，进行社会动员的主导话语。极右势力也许短期内无法在欧洲主要国家取得执政地位，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却会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欧洲的威胁在于，如果极右势力主导若干主要国家的政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欧洲一体化的挫折也会对欧洲政治经济 and 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不少欧盟创始人想实现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梦想。但如果不存在共同的身份认同（common identity），将很难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恰恰缺乏一种强劲的共同欧洲身份认同，它会维持多长时间呢？欧盟一旦解体，它会采用何种方式解体？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挑战也不仅是对欧盟的挑战，更是对整个欧洲近代以来启蒙运动文化的根本挑战。启蒙运动的文化在欧洲以自由主义为主基调，强调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理性，强调宽容，并从早期的宗教宽容发展为文化多元主义。但是这种大的文化趋势在后现代主义和前现代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正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欧洲近代文化是否会遭遇重大挫折，体现了启蒙运动理想的欧盟能否经受住这种挑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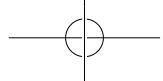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李强教授最后总结了她的看法，世界政治的格局从利益政治逐步转变为认同政治，这样一种转变将会深刻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以及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的运作方式，从而使我们面临一个完全新的政治的格局。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发言题目为“法国新民粹主义引发的思考”。沈坚教授首先分析了民粹主义定义的迷思。与一般的“主义”不同，民粹主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在法语中，民粹主义（populisme）往往是贬义词，等同于一个源于希腊的词汇“demagogie”，“demo”意指“人民”，“ago”意为引导。在法语当中，民粹主义这个词是晚近的词，从词源来看，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e）一词引伸出来。在法国还有一个文学上的用法，就是被称为人民主义的作家，但这种文学上的用法现在不常用了。比较晚近的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与法国极右势力的上升有关，1984年法国政治学家 Pierre-André Taguieff，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威权的解决方案”，它建筑在领袖魅力之上，以号召人民反对精英寡头统治为特征。这一定义随后在八、九十年代引发广泛讨论。法国历史学家维诺克（Michel Winock）引用了这个定义，并将其分为几个层次：这是一种“抗议式的运动”（un mouvement protestataire）——反对精英，例如知识精英、“脱离人民”的政治人物等；同时它也可以称得上“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populisme），即是一个“固守民族身份的运动”（un mouvement identitaire）——它是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排外的、仇恨穆斯林的、反欧洲统一的。但这一定义依然是不清晰的，它是用煽动性的修辞语言诉诸人民利益，以人民名义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症候（sympt·me）和政治现象（phénomène）？或者它是一种风格、姿态，是没有内容的形式，亦或是情绪化的表达？

沈坚教授接着探讨了法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如果在维基百科查询民粹主义的英语词条和法语词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英语词条把法国民粹主义定义得非常宽泛，将民粹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的民粹主义条目则不包括这些，只涉及布朗热主义运动和布热德运动。从语言分析来看，法国人把坏的东西才当做民粹主义。如果说存在争议，例如罗伯斯庇尔、路易·波拿巴，均满足诉诸人民、魅力领袖这些条件，但却未被归入民粹主义。所以在法国，语言的背后指代的历史上民粹主义，是将坏的才归进去，而可好可坏存有争议的则不归进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法国人对民粹主义的看法。

沈坚教授继而分析了法国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新民粹主义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国民阵线。国民阵线这个组织最早被认为是法西斯的，也有认为是极右的，但是没有归入民粹主义，只在最近这两年被归到民粹主义。它1972年建立，一开始就定位于政治上的极右位置，它所模仿的就是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它自称“社会的、人民的、国民的右翼”，采取反现存体制的立场，“反对过时、腐败、无能的多数”“反对破坏者、乌托邦的、镇压者的共产主义”是国民阵线最初的口号。它的党魁让-马利·勒庞很快在该党的纲领中纳入他个人的思想：反移民和排外，提高出生率增加法国人口。反移民思想逐渐被法国部分民众接受，这反映在国民阵线的选举业绩。在第一个10年，国民阵线在选举中进展甚微，常常不到选票的1%。从1983年起形势发生变化，在各种选举中，它的得票率都超过了10%，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党魁勒庞的选票达15%。2002年总统选举，勒庞第一次进入第二轮的角逐。

1998年，党内发生分裂，国民阵线一度消弱。在勒庞的女儿玛丽纳·勒庞继续党主席后，国民阵线再度发展。玛丽纳·勒庞致力于“去妖魔化”，表现得比她父亲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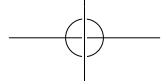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不反犹，反种族主义，不涉及二战议题和殖民战争议题，改善了国民阵线的形象。在政策上，提出“国民优先”（补贴、就业等），世俗化（反对宗教团体，取消学校食堂的清真点、取消市游泳池的分时段制），反移民、反经济全球化（加强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加强社会治安、加重对犯罪的惩罚（真实的终身监禁和恢复死刑）；在政治制度上，要求恢复总统任期7年制但不得连任，宪法修改必须交由人民决定（公投），公投的发起权在人民（而不是现在的平分制），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让人民决定是否退出欧盟、退出欧元，并主张退出北约。玛丽纳·勒庞获得的选票逐渐上升。2012年玛丽纳·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17.9%的选票，排名第三。这一成绩（得票数）超过了他父亲。2014年的市政地方选举，国民阵线得到了1544个市议员的议席，有些候选人在第一轮中就胜出。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率达到24.86%，名列法国各党派的首位。2014年法国参议院选举，国民阵线有二人当选，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参议院。2017年总统选举，玛丽纳·勒庞毫无悬念地进入到第二轮角逐。

新民粹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左翼的“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叫梅朗松。他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原因在于，他要废除第五共和国，建立第六共和国；重新签订欧盟条约，改变欧盟货币政策，如果无法达成，就实行B计划即单边退出欧盟，与其他国家单独签署合作协议。尽管梅朗松自认为是亲欧派，但他被视为疑欧派，这主要是基于重新签订欧盟条约是不可能，而一旦不可能他就会单边退出欧盟。在媒体和公众集会场合，梅朗松的语言极具煽动性，表现得更为激烈。2014年，他发表了小册子《人民的时代》，提出人民要打倒富人寡头，打倒为富人利益服务的政治家镀金种姓，打倒那些麻痹人们精神的媒介大亨；他还认为，对民粹主义的仇恨仅仅是害怕人民的一个变种。

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势力高涨。整个2017年总统选举有11位候选人，真正有能力上位的是

5位，这5位竞选人的口号都很有意思。社会党的领导人阿蒙是“让法兰西心跳”，右翼的菲永是“心系法兰西”，“前进！”党（这个惊叹号不能省）马克龙是“一起来吧，法兰西”，勒庞的口号是“以人民的名义”，梅朗松是“人民的力量”：所以是三个“法兰西”对两个“人民”，后者就是被称为人民主义的，或者民粹主义的，而正规的体制内的政党，基本上不用“人民”，用“法兰西”。第一轮得票，勒庞21.3%，马克龙24%，其中真正赞成欧盟的是菲永和马克龙，两者加起来还不到50%。对选民的政治态度做一些细致分析可以看出，左和极左是在梅朗松和阿蒙，右翼是在菲永，马克龙在中间位置，勒庞在极右；上层和中产阶级主要支持马克龙、菲永、阿蒙，下层阶级则支持勒庞、梅朗松；在年龄上，青年主要支持梅朗松，中青年则是勒庞，中年是马克龙，老年是菲永。如果青年代表未来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乐观，会是一个问题。

沈坚教授最后简要分析了新民粹主义的挑战。一是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民粹主义与民主制（人民主权）构成一种悖论。民粹主义（populisme）词根来源于“人民”，民主政治的根本也是“人民”，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民主权。同样来源于“人民”的两个词，一个贬义，一个褒义。这使人们疑惑，难道有不一样的人民，难道亲近人民有好坏之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一词的模糊性：谁是人民，谁能代表人民，这可以有不同理解。在“人民”概念的抽象性和具体实施的个体性（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之间存在张力，这使得法国人自身也在反思自己的政治制度。二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冲击，随着工人都转投右派，以及工人都反对全球化，那么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到底是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如何联合起来，如何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初由西方推动的全球化反而受到西方民众的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民利益的重新洗牌要求新的调节和平衡。四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其民意基础面临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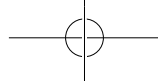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波匈轴心’与欧盟的冲突及其影响”。孔田平研究员认为，欧洲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欧盟的问题成员国，即这里谈及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最近几年，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在欧洲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但是在西欧，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从来没有取得执政的地位。然而在中欧国家，以匈牙利、波兰为代表，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取得了执政的权力。4月8号，匈牙利刚刚举行了选举，欧尔班继2010、2014当选之后，2018年再次当选。波兰执政党是法律与公正党，这也是一个右翼的民粹的民族主义政党。在2015年，波兰举行总统选举、议会选举，法律与公正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以说从2015年法律公正党上台之后，“波匈轴心”便形成了。欧洲有法德轴心，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波匈轴心”两个国家其实作为新成员国，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各个方面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它实际上对欧洲一体化的破坏力量不可低估。

“波匈轴心”形成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两个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政纲的政党在两个国家掌握了政权，这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欧尔班与波兰执政党主席卡钦斯基具有非常相近的政治理念。第一点是反对1989年开始的转型，匈牙利的欧尔班认为，匈牙利1990年以来的变化是不完全的变化，因为匈牙利未通过新的宪法；卡钦斯基更加直接，他甚至完全否定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达成的协议，认为这个协议是一个交易，就是让共产党的权贵可以继续保持其财富和特权，而作为交换，团结工会的精英也可以被拉拢参加政权。卡钦斯基认为波兰是一种病态的后共产主义的体制，他希望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后要打破这种格局。第二点是反自由民主。欧尔班认为，“我们在匈牙利建立的新的国家是非自由的国家，是不自由的国家。它不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自由，而是不使这一思想成为国家组织的中心因素，而因该包括不同的、特殊的民族方式”。卡钦斯基也认为，法制国家不必是民主国家，

民主的法制国家不等于法制国家。第三点是疑欧或反欧。欧尔班认为，欧盟是由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机构旨在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但目前的实践似乎与此背道而驰；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欧盟是由机构组成的，成员国的存在只是为了支持机构的运作。欧尔班认为，欧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该是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这损害了欧洲机构的运行效率；第二个错误是将欧盟委员会重塑自身成为政治行为体，与作为条约监护者的作用大相径庭；第三是为了提高欧盟的效率，欧盟使理事会以多数票而不是一致同意来代表成员国重大利益成为可能。卡钦斯基也是批评欧盟的，认为欧盟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组织，这个国家就是德国。他认为“我们需要民族国家的欧洲，需要更少的集权”，而且卡钦斯基明确认为需要重新谈判欧盟条约。

“波匈轴心”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具有相似的治国方略。从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10年到2015年的政治事件来看，匈牙利确实已经牢固建立了非自由的民主。匈牙利执政党连续三届都取得议会超级多数议席，任何法律和宪法都可以修改。从2010年开始，欧尔班基本上一方面修改了宪法，另外一方面限制独立机构的作用，限制宪法法院、中央银行以及其它法院的独立性。波兰从2016年以来，通过了对宪法法院法的修正，可以说使执政党控制了宪法。在过去一年，法律与公正党试图限制法院的独立性，并且增加执政党对法院的控制。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完全告别1990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强调国家干预，强调国有化，强调社会福利。

“波匈轴心”与欧盟之间的争论，一方面关于民主法制，欧盟认为波兰、匈牙利已经动摇了法制，并对欧洲共同价值观产生冲击。其次关于难民问题的应对，波兰、匈牙利反对难民摊派方案。其实很少有难民愿意到波兰、匈牙利，但是政治家利用这一问题大作文章、制造恐惧。最后关于欧盟机构的运作，对欧洲未来的思考，“波匈轴心”反对欧盟委员会，希望权力回归成员国。



孔田平研究员最后指出,波兰、匈牙利原来是政治转型、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样板,但现在变成了一个欧盟的问题成员国,这会对欧洲一体化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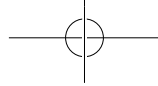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连玉如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德国默克尔新政府的欧盟政策辨析”。连玉如教授首先对欧盟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她选择德国作为发言主题的原因。欧盟是一种双重的、杂糅的东西,既有政府间的合作,同时也具有超国家性。二战以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对二战以前我们理解的诸如意识形态的欧洲、军事政府的欧洲、均势的欧洲的一种质疑、一种摒弃。二战以后强调通过共同协议来共建欧洲,共同协议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各个成员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签订,签订之后还需得到各个成员国的批准。

欧洲一体化在二战结束以后,首先在西欧发展起来,这是同解决德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解欧洲不能不首先理解、了解德国,认识德国是把握欧洲问题的一把钥匙。从近十年来看,欧洲出现一系列的深重的危机和挑战,而且扎堆蔓延。在这个挑战面前,欧盟现有的机构及其政治精英应对乏力、招架无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地位和作用就非常的抢眼。尽管大家对默克尔应对危机的做法看法不一,褒贬兼有,比如对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做法是认同的,认为她是领导者;但是在希腊危机、欧债危机中大家批评她是霸主;在难民危机面前,人们又嘲讽她是奉行道德帝国主义的孤家寡人。德国的强势的主导作用,使整个欧盟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失衡的困境。因而探讨德国默克尔政府的欧盟政策,对于理解欧洲的挑战与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3月14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投票中第四次当选德国总理。上台第二天出访法国,开启她的欧盟政策。她

的欧盟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表现在采用她青睐的联盟式方法。联盟式方法与共同体方法相对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非常强调使用共同体方法。这一方法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在立法流程方面,由欧盟委员会倡议、提草案,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讨论并做出决议。默克尔比较青睐的联盟式方法具有政府间主义合作的性质,主要是通过欧洲理事会会商和议决问题。理事会由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组成的,表决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全体一致通过原则。人们一般将这两种方法视作对立的,但默克尔反对这样的一种对立的看法。按照默克尔的解释,她首先认为联盟式方法具有综合的性质。默克尔认为,联盟式方法是共同体方法和成员国之间协调行动兼而有之的综合性的方法。她说不应该把欧盟看成一个可以分割的一件事,而应该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无论一项欧盟政策目标有多好,也必须由各个成员国协调行动去实现。默克尔认为这是联盟式方法的要义。而且她进一步解释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方法选择哪一个,而是在于行动或是不行动。其次,联盟式方法的指导思想是里斯本条约确定的辅助性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个人能做好的事或者欧盟成员国能做好的事,欧盟就不要干涉;只有成员国自己做不好,需要欧盟介入才能做好的事,欧盟这个时候才会介入。辅助性原则的理论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自助;第二,他助;第三,功能性。默克尔处理欧债危机时也是本着辅助性原则在处理,希腊危机发生后,需要自己检查危机的根源在哪儿,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就要自己做好家庭作业,也即必须先自助;必要的时候,包括欧盟在内的成员国再担负起共同的责任,也就是实行他助。

默克尔主张这种联盟式方法,说到底还是强调成员国的作用。成员国中德国是最强大的,所以现在的一些问题都和欧盟的结构失衡,德国的强势有很大的关系。欧洲的发展逻辑是要寻求平衡的,不能容忍哪个国家做大或者称霸,理论上讲,这对所有的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在



现实中，则主要是针对背负着纳粹历史罪名的德国。二战以后，发端于西欧的欧洲一体化事业就是从解决德国问题入手，是框住它或者再平衡德国优势的一种进程。在当前欧洲各方面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实际上德国的情况是少有的好，德国很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是多年来少有的。德国经济增长很不错，就业的情况也是统一以来最好的，工资也在上升，财政是黑字财政，不是赤字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卓尔不群等于是自我孤立；强调别人要自助先行，势必引起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对冲你的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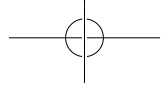
连玉如教授认为，默克尔在其第四任期的对欧盟政策方面，还会坚持她的联盟式方法，强调成员国作用。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人口最多、实力最强，潜力、实力各个方面都不错，怎么重新克服欧洲这种结构失衡的局面，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德国人必须要有一种照顾其它国家敏感神经的人们称之为“指尖上的敏锐”的东西，这使德国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局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对下半场的发言作了点评并对四位发言人提问。王希教授指出，前两位教授集中在民粹主义上，后两位则提供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分析。王希教授对四位发言人分别提出如下问题：利益是否也是认同政治的构成要素，认同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共同的宪法可以作为认同的对象吗；民粹主义对法国传统怎么看，是爱国主义吗；波兰和匈牙利在历史上有什么渊源吗，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默克尔的方法能否奏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也作了简短点评。黄燎宇教授指出，欧盟的现实是支持率下降，各个成员国出现分裂。出现这种离心倾向的原因是欧盟的纽带出了问题，欧盟成员国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其实缺乏共性。钱乘旦教授也向李强教授提出了问题：中国的民本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什么关系。

李强教授对提问作出了回答。利益政治有比较专门的含义，个人利益形成阶级利益，阶级利益基于意识形态形成政党，这种阶级利益的划分比较明显。可以认为在认同政治中，某种程度上也有利益这一要素，比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的白人男性。但如果对认同政治中的利益进行严格分析，比如美国白人受到损害，与墨西哥移民可能从逻辑上来讲没有太多联系，可能美国很多农场主便雇佣了许多墨西哥人。但认同政治依然会在民族或种族问题上做文章，这与原来利益政治的经济基础是不一样的。关于一部共同的欧洲宪法能否作为共同身份认同的对象，政治理论中便有宪政爱国主义的理论。美国和欧洲有所不同，在美国形成宪法之前，尽管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但是殖民地十三州应该可以说有一个人民逐渐形成了。但在欧洲没有人民的形成，语言文化等各方面都是有差异的，所以很难用一部共同的宪法来作为认同的对象。民粹主义与民主差别不大，人们不喜欢的就叫民粹主义。但是，现代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纯粹的民主（pure democracy），例如美国、英国的民主框架里都包含民主和非民主的成分。民粹主义要求的，就是要把所有非民主的成分打掉。民粹主义本身不可怕，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包含着非常丰厚的民粹主义的土壤。今天问题糟糕的地方就在于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结合在一起，他们那种强烈排外的、不宽容的民粹主义会产生很多糟糕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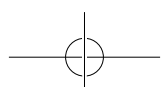
沈坚教授对提问作出了回答。右派非常想信守法国原来的文化，也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左派也讲文化，认为现在最大的不安不是生活的不安，而是文化的不安，也即原来带来价值观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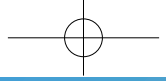
孔田平教授对提问作出了回答。波兰和匈牙利两个民族从种族上来说是不同的种族。波兰和匈牙利双方的语言的波语和匈语中都有一首诗，描述两个兄弟，一起畅饮、一起战斗。历史上，有匈牙利人曾经担任过波兰的国王。



1956年遭遇苏联干涉时，匈牙利、波兰两国也是相互支持的。至于最近非自由民主轴心的形成，更多是国内政治的演化。两个国家从1990年开始的转型战略是不一样的，匈牙利实行渐进主义，原来比波兰强，现在被波兰赶超；波兰其实是中东欧转型成功的国家，经济下降两年之后从此保持了持续增长，但这也不能阻止波兰滑向非自由民主。这里面反映的问题是，大城市之外的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普遍感到在转型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卡钦斯基和欧尔班在公开活动表示要更加强调祖国、民族强大的国家，强调传统历史政策、基督教、家庭主义，而不是现在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李强教授观察说左翼衰落了，自由派正在衰落，右翼在上升，其实波兰和匈牙利正是这是这种情况。

连玉如教授对提问作出了回答。默克尔的方法能不能奏效，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的困境。欧洲既需要德国，但是又不想认同德国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纳粹德国的历史的阴影，另一方面在于德国确实是一个强权。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孤立是德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德国人绝对不能孤立，不能自我孤立，更不能被别人孤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发挥所谓法德双引擎的主导作用。





记录：张睿

整理：陈浩宇、徐晓红

审稿：翟崑

